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 陈平原 主编

北平的大学教育 与文学生产： 1928—1937

季剑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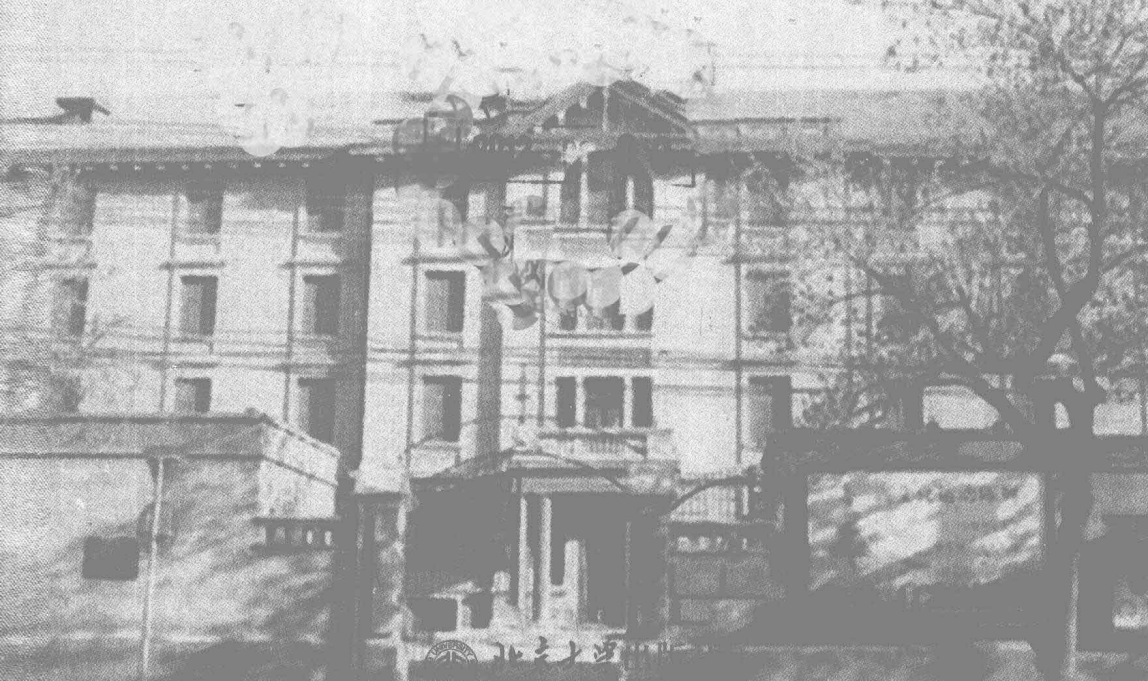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 陈平原 主编

北平的大学教育 与文学生产： 1928—1937

季剑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季剑青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ISBN 978-7-301-18407-3

I. ①北… II. ①季…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史—北京市—1928—1937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1816 号

书 名: 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

著作责任者: 季剑青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407-3/I · 230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8 印张 300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总序

陈平原

美国学者 Richard Lehan 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第 289 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

与“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必须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与香港及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今人之谈论“都市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歧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相对于诗人的感伤、客子的怀旧或者斗士的抗争，学院派对于曾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的描述与阐释，细针密缝，冷静而客观，或许不太热闹，也不太好看，但却是我们进入历史乃至畅想未来的重要通道，必须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欣赏。

本丛书充分尊重研究者的眼光、趣味与学术个性，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讨论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偏于艺术或文化。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我们全都“虚位以待”。

2008年7月22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目 录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陈平原/1

引 论/1

第一章 大学文学课程与文学想象/16

第一节 考证与鉴赏/17

第二节 “文学”与“文学史”/24

第三节 文学本位/31

第四节 想象新文学/36

第五节 “现代”与“传统”的发现/48

第二章 学院背景下的文学批评/59

第一节 “文学概论”与“文学批评”/59

第二节 “实际批评”的兴起/67

第三节 李健吾：“自我”的限制与学者的眼光/78

第四节 李长之：批评的教育意义/85

第三章 学术视野中的新诗/98

第一节 文学史的观照/99

第二节 诗论：中西之调适/115

第三节 读诗会/127

第四章 社团与人际网络：大学中的文学空间/143

第一节 早期校园文学社团/144

第二节 人际网络/150

第三节 大学中的左翼思潮/166

第四节 左翼文学社团/176

第五章 学院内外:场域分化与文类选择/200

第一节 学院派/203

第二节 “学院”与“文坛”/223

第三节 文艺青年/234

结 语/247

参考文献/256

人名索引/273

后 记/281

引 论

1940年,沈从文在《文运的重建》一文中谈及新文学与大学的关系,认为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支持,而新文学“一与学校离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到民十六以后,就只好放弃了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进取精神,把师生精力向音韵训诂小学考据方面去发展。这结果在学术上当然占了一个位置,即‘老古董’位置”。在沈从文看来,“文运与大学一脱离,就与教育分离,萎靡、堕落、无生气,都是应有的结果。学校一与文运分离,也不免得保守、退化、无生气、无朝气”^①。

^① 沈从文:《文运的重建》,《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81—82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强调文学运动与大学相结合,是沈从文40年代的一贯立场,曾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表达^①。撇开这一立场及其中所包含的关怀暂且不论,沈从文对新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所体现出的宏大视野,却提示出观察新文学史的一个独特的角度,即从大学与新文学(“文运”)的离合与互动,来梳理新文学史的脉络。在沈从文的视野中,从五四到北伐,大学(主要是北京大学)对于新文学的发生与扩展意义重大,北伐以后,随着文学中心转移至上海,新文学因遭致商业与政治的双重侵染而萎靡堕落,而在北平,脱离了“文运”的大学,亦陷入狭隘逼仄的考据之学中,转为保守退化,其结果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沈从文的历史叙述中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判断,按诸历史实际情形,20世纪30年代大学与“文运”的关系是否如此截然,其实大有商榷的余地。尽管新文学的中心转移至上海,北平各大学仍然以某种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的方式参与到新文学中去,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北平各大学中的师生,怎样表达他们对新文学的关切,凭藉怎样的资源和策略,参与到新文学的生产(不仅是作家作品的生产,还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及历史叙述的生产)中,在这些方面,作为学术和教育机构的大学,发挥着怎样的社会功能,不同的大学乃至大学内外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具体分析,便构成了本书的基本任务;而在最后,我们可以期望获得一幅汇聚着各种文学想象的、面貌丰富的文学史图景。

新文学的发生,从一开始就与现代大学密不可分。文学革命基本上由当时北大师生及以其为主体的《新青年》杂志所发动,这已成为文学史上的

^① 参见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全集第12卷)、《文学运动的重建》(全集第17卷)、《纪念五四》(全集第14卷)等文。《纪念五四》中有一段文字几乎和此处引文基本雷同,见第298—299页。

常识,学者多有论述^①。文学革命发轫于当时的最高学府,其实并非偶然。如钱理群所指出的,1917年前后,知识精英从“皇宫转向北京大学”、“从高层政治转向民间道路”的活动空间及社会变革思路的位移,标志着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由依附强权,充当幕僚、‘国师’,因而终不免为‘官的帮忙与帮闲’,转而依靠自身,充当思想启蒙的主体,实现思想、学术、教育、文化、文学的独立。”^②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翼的文学革命,自一开始就带有借启蒙大众来推动社会变革的性质。就“以‘运动’的方式来推进文学事业”^③而言,集合了新式知识精英的大学无疑是最理想的场所,因其中同类相应,同气相求,极易造成声势。而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学生群体的传播,新思潮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造成影响^④,此即沈从文所说:“领导的既由大学师生,所以对学生分子影响特别大。这影响直接虽限于学校,间接实普及全中国。”^⑤而当时学生在此方面也颇为自觉,如傅斯年就说办《新潮》旨趣正是要“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使“大学之思潮”,可以“普遍国中,影响无量”。^⑥

大体而言,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即以这种“运动”的方式推进^⑦,而其主要的依托就是北京大学及北京的其他大学。从教授到学生,都有意识地利用大学作为推进文学运动的根据地。1922年胡适

① 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收入《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第二章“北京大学学术化氛围的开创与‘一校一刊’相结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② 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程光炜主编《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第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③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傅乐诗在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中,即强调大学在五四运动发生中的重要作用,参见傅乐诗:《五四的历史意义》,收入刘桂生、张步洲编纂《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论著摘要》,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⑤ 沈从文:《文运的重建》,《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81页。

⑥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

⑦ 关于新文学的“运动”形式,可参见钱文亮:《都市、群众与新文学的“运动”形式》,收入《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推荐周作人到燕京大学主持国文系,即有开辟新文学另一片天地的意图。^①而当时的学生文学社团更是风起云涌,且多能得到师长辈的支持(以北京大学而言,即前有新潮社,后有沉钟社)。1926年前后,伴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左翼思潮亦开始在北京各大学中风行,各种演讲、宣传俱以学生为主体,他们的文学社团(莽原社、狂飙社、未名社等)及其刊物也开始自觉地呼应实际的政治运动。^②

实则从五四运动之后,学生即有成为某种特殊阶级的趋势,而成为各方政治力量争相争取的目标。学生也成为各种运动(包括文学运动)最重要的载体。^③然而现代大学在培养出大批学生的同时,还承担着另外一重学术研究的功能。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作为各种学生运动(包括文学运动)的中心而引人注目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大学作为文学运动中心和学术研究机构这两重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日益显得突出起来。

早在五四时期,这种紧张关系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呈现。今天的学者多会关注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如何为新文化运动提供学术资源和文化资本^④,不过在时人眼中,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却不能混为一谈。1919年,针

① 参见胡适1922年3月4日日记,《胡适日记全编》(三),第56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又见周作人《一三七·琐屑的因缘》,《知堂回忆录》(下),第46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 沈从文晚年对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北京的大学文化氛围有如下的忆述:“我很清楚地记得天安门前那些讲演,都是临时从附近的司法部街茶馆里面抬个凳子来,站在上面演讲,讲演完了再把凳子退回去。参加听的人可以说老百姓是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各大学的学生,但是这个意义深长得很,就是为什么武汉革命的时候,打到武汉以后北方就垮了,这就是大学呵文化方面宣传有一定的贡献。因为当时这些刊物啊,《语丝》、《莽原》、《京报》副刊……出版也就是千把份,但是它的影响是全国的。”见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第59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 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④ 参见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第二章“北京大学学术化氛围的开创与‘一校一刊’相结合”。陈平原亦指出北京大学为《新青年》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资源——包括象征性的以及实质性的”,见《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106页。

对林纾对北大的指责,蔡元培即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这诚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压力下自我保护的考虑,不过在回应林纾称北大“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的攻击时,蔡元培强调的还是《新青年》诸君的古文水平与旧学功底,可见在根本上,蔡元培仍是认同大学当研究高深学术这一立场,文化运动多少是校外之事。^① 余英时后来谈及胡适五四时缘何“暴得大名”时说:“如果胡适的成绩仅限于提倡白话文学,那么他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度的,但是他的思想在上层文化领域之内所造成的震动却更为激烈,更为广泛;他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②所谓胡适在“上层文化领域之内所造成的震动”,主要指的是他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及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余英时把“白话文学”划归入“通俗文化”领域中,容有可议之处,但他的论述却提示我们注意到大学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两重功能之间的缝隙。当时如傅斯年就曾在致校长蔡元培的信中说“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希望此后北大能在学术与科学上精进。^③ 约在同时,胡适在一次演说中,也对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质疑,认为不过是“新名词运动”,若要真做一点“文化运动”,还得从学术上着手。^④ 对于胡适和傅斯年的意见,蔡元培亦表同情,1926年他在给胡适的一封复信中即云:“承示北大当确定方针,

① 蔡元培:《答林琴南书》,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65—170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其实内在地包含了某种紧张,如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所指出的:“蔡的内心对于两种不同的观点一定难于取舍。一种观点认为北大作为独立性的学术机构应与社会保持距离;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北大作为唯一一所由社会捐资助学的学校,它的责任不仅在于教学,同时也应担负起社会责任。”参见魏定熙著,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第17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序言第2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③ 《傅斯年君致校长书》,1920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

④ 《胡适之先生演说词》,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

纯从研究学问方面进行,弟极端赞同。”^①

1921年前后的北大国文系,还设有文学概论、英诗译读、西洋戏剧与小说一类的课程,“那时北大国文系的学生除却关于中国语言与文学的种种课程外,还有机会读一读俄国的小说、北欧的戏剧、英国浪漫派的诗歌,听一听当时正在流行的勃兰兑斯、法朗士等人的批评理论”,可见校内的文学教育与校外的文学运动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互动。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研究的加深与标准的提高,文学概论以及西方文学类的课程都被取消,北大国文系只剩下中国语言文学类的课程^②,而即使文学类课程,也如沈从文所说的向“音韵训诂小学考据方面去发展”。其实,傅斯年很早就说过:“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③已然将“文学”从“学术”中排除出去。事实上,日后的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处理的对象包含大量中国文学的材料,并且多以大学国文系及附带研究所为根据地,但基本上不涉及文学的欣赏创作,更遑论参与到当下的文学活动中。北大向专业化学术化方向发展已是大势所趋,而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分野也日益明显。

整体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渐趋成熟,“至少从表面上看,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新一代知识分子辛勤地从事教学与科研活动,并开始探索全新的领域,中国似乎已到达腾飞的起点”^④。钱穆即说“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⑤。梁实秋当时亦云:“今日之一般教授与十年前之一般教授不可同日而语。从前得以滥竽教席者,现今恐不易插足于大学。现今的人才,比从前为多,竞争亦较以前

① 《蔡元培致胡适》(1926年5月1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26页。

② 冯至:《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冯至全集》第4卷,第11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③ 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

④ 孙任以都:《学术界的发展(1919—1949)》,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4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⑤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50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为烈,故教授资格水准亦渐渐提高,这是事实。”^①不独国文系如此,外文系亦然。1919年,时在北大任教的宋春舫写信给蔡元培抱怨法文系缺少教员,“向日我国留学法、比者,专注重实业、政治、科学,而于文学方面往往轻易视之”,不得已只能滥竽充数。^②英文系的情况亦不尽如人意,徐志摩曾披露“现在堂堂北大英文文学系的几个教师,除了张歆海先生他是真腔直板哈佛大学文学科毕业的博士而外,据我知道谁都不曾正式学过文学。温源宁先生是学法律的,林玉堂先生是言语学家,陈源先生是念政治的”,而他自己则是“学过银行的”。^③此种情况到20世纪30年代已大有改观。一批以欧美文学为专业的留学生相继回国任教,使得大学外文系的教学科研渐渐步入正轨,如柳无忌所注意到的,他们对西洋文学的系统研究与介绍,使得早期的新文学作家相形见绌:“新文学提倡者精通西洋文学的是极少极少”,“从前的新诗作者对于西洋文学缺乏深刻的了解”。^④

大学的日益学术化,固然是大学自身的要求,然而同时亦须考虑到外部特定的政治和历史条件。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国民革命兴起之后,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几乎难以分离,特别是在北京,“因为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大学也跟了政治化,全国大学的风潮,闹得最多最凶,就是北平的学校”^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改名为北平,不再成为政治中心,同时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压制学生运动,取消学生团体,整顿学风,力图将大学转移到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来。^⑥学术化作为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

① 梁实秋:《整顿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梁实秋文集》第7卷,第331页,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

② 宋春舫致蔡元培函,1919年12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

③ 徐志摩:《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便乘便妄想解围》,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2卷,第345—34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④ 柳无忌:《为新诗辩护》,原载《文艺杂志》第1卷第4期,1932年9月,收入柳光辽、金建陵、殷安如主编《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第97—9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⑤ 赵家璧:《中国大学之清算》,《中国大学图鉴》,第17—18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3年。

⑥ 参见 Huang Jianli(黄坚立),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 Berlin; etc: Peter Lang, 1999, pp. 55-75.

一项政策,本身即包含着压抑学生政治活动的意图。然而,学生的政治活动及政治化的文学活动不可能因此销声匿迹。^①北伐过后,不少青年学生又重新从战场返回校园,左翼思潮在大学生中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就北平而言,在那些学术化取向较弱的大学——如北平师大、中国大学——中,左翼的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仍然相当活跃。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各大学的学术化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像北大、清华这样学术化取向较强、较为精英化的大学中,对学术研究的强调,使得它们基本上很难再成为文学运动的中心。尽管当时的北大、清华仍然活跃着相当数量以新文学家名世的大学教授^②,如杨振声、胡适等甚至有意在大学国文系中提倡新文学的研究与创作,然而终不免于失败,其实与大学学术化专业化的转向有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就与新文学绝缘。大学的学院化倾向,在让大学远离现实文学运动的同时,亦使其获得了某种超然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在这里,新文学是作为某种学术对象进入到大学的视野中的,这不仅是指新文学研究的学科建构,更重要的是新文学历史与现实的诸种问题是被放置在学术的背景下来考察的。诸如传统与现代如何沟通,中与西如何调和,这些始终纠缠着新文学的问题,也渗透在大学的课程设置、学者的学术研究之中。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中,既包含着对新文学历史经验和当下现状的反思,也包含着对新文学未来的种种构想,这其中体现出怎样的视野和眼光,其意义又何在,都值得认真探讨,本书前半部分即聚焦于此。通过对某种“学院的逻辑”的分梳与呈现,或可对“传统/现代”

①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运动,参见John Israel(易社强),*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② 至少在时人眼中,与南方相比,北平的大学仍表现出趋新的色彩,如在自居保守的川大看来,“中央大学和东北大学在文史方面均偏向于‘旧’,北平各大学则偏向于‘新’(文学方面重新文学,史学上重‘历史整理’,近于‘新考据’)”,见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第13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邓云乡亦云:“在文化古城时期,大学中也往往是新的影响大,古老的影响小。”见《文化古城旧事》,第3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另外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南方大学一般都要用文言文,而北平的大学则鼓励用白话文,至少也是文白均可,见《文言与白话(一)》,1934年11月11日《北平晨报》第9版。

“中/西”等新文学中的宏大命题有更加具体和真切的理解。

而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则尝试引入场域的角度,将学术化取向较强的北大、清华与较弱的北平师大、中国大学,以及大学外的文艺青年,放置到一个相互参照的关系中来理解。我们会看到,对于那些参与到新文学中去的人来说,由于身处于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大学,大学内及大学外),能够凭借的资源无论在性质上还是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由此形成不同的立场(对左翼的态度,对文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不同看法),运用不同的策略和文学生产的机制(师生关系、社团刊物、人际网络等),并发展出不同的文类选择的倾向。这并不是某种“场域决定论”或“空间决定论”,无论是何种策略和立场,都是参与者依据各种外在条件主动选择的结果,但是这些外在条件却具有客观性。比如当时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中左翼思潮都很风行,但是在那些学术化取向较弱的学校中,左翼文学活动可以找到对它最有利的条件。^① 在各大大学之间及大学内外形成的场域结构中,隐含着某种权力关系,它时刻调节着场域中各个位置之间的资源分配与力量对比。当然,这种权力关系本身即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且会随着政治形势而发生变化。

引入文学史中通常不会提及的北平师大、中国大学以及大学外的文艺青年,并非要从中发掘出为人忽略的作家作品,而是为了将对象置于更大的语境、置于相互之间的关系中来理解,使它们相互照亮之前为我们所不见的层面。在20世纪30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作为学术机构的大学还是作为学生运动中心的大学,无论是学院派还是左翼的青年学生,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想象,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都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性,当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时,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二

从以上的问题意识出发,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大学文

^① 就左翼的政治活动而言,当时的清华、燕大等校也相当活跃,不过总体来看,特别是在1935年之前,这两校国文系、外文系的文学教育仍是相当精英化的,详见第四章相关内容。

学课程的设置及其所表达的文学想象,主要以北大、清华等校为对象。国文系如何处理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外文系又如何借助现代眼光反观本土传统,是本章关注的主要内容。第二章考察的是学院背景下的文学批评,对象主要是一批外文系出身的学院批评家,在学院中形成的逻辑和视野如何渗透到他们的批评实践中,是本章要处理的主要问题。第三章则将目光转向学者的学术工作,看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新文学构成了怎样的对话关系。对于国文系的教授来说,面对的是如何把新文学与古典传统整合到文学史叙述框架中的问题;而对外文系的教授来说,他们更多考虑的则是如何在一个更大视野中,超越和弥合“中/西”“现代/传统”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本章选择新诗作为个案,不仅是因为这些学者对于新诗有普遍的兴趣,同时也是由于在新诗方面,这些问题表现得最为尖锐和突出。总的来说,这三章涉及的对象范围主要是北大、清华这两所当时学术化取向较强、学院化倾向明显的大学,并且集中在它们的国文系、外文系的教授学者身上。在这里,大学的主要功能是知识生产,其中隐含的“学院的逻辑”投射到他们对新文学的反思及想象中,表现于课程设置、批评实践、学术研究等各方面。而国文系和外文系在这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由于要面对五四反传统的“范式压力”,因而在处理新文学和古典传统的关系时充满了紧张;后者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超越“中/西”“现代/传统”的“普遍性的视野”,然而这种视野却仍是在西方(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刺激下形成的。^①

本书的后面两章则将视野扩展到北大、清华之外。第四章主要分析当时北平不同大学中的文学青年,如何凭借不同的位置和资源,发展出不同的

① Shu-mei Shih(史书美)在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中探讨了“京派”(Beijing School)知识分子如何在一种普遍主义的框架中对五四反传统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作者认为他们关注的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性或全球性,而不是五四反传统一派(iconoclasts)鼓吹的欧洲中心的普遍性”(p. 153)。他们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间发现一致性,形成了真正的普遍主义的视野。作者同时也注意到“他们对传统美学的再评价,是以他们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其他文学潮流的知识作为中介的”(p. 188)。史书美所说“京派”实际上包含了梁漱溟、学衡派等所谓的“新传统主义者”,其内涵远较通行的“京派”概念为广,也并未提及学院背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她的思路对本书却有很大的启发。